

朗文說：「據當代新儒家劉述先的觀點，先於蒂利希不知多少年，孔子早就提出了「沒有上帝的信仰」的觀念。」對我的觀點作這樣的解讀不免令我感到錯愕，因為我從來沒有說過孔子提出「沒有上帝的信仰」的觀念。朗君似乎也有必要超越自己的「成見」，不要對一些不同角度的議論作出過度的解讀罷！

身立命之道。對於我來說，「古已有之」並沒有甚麼意義，我也不認為，凡是中國的一定就是好的。事實上我那篇文章的結語是：

人必生於一個傳統之中，而傳統對我們的作用有雙面性：既給與我們教育，也給與我們繫縛。對於傳統所開創的睿識，我們必須不斷給與解釋與再解釋 (reinterpretation)，賦與其現代的意義；對於傳統的限制，我們卻必須加以突破，而加以改造 (reconstruction)。中國傳統有豐富的資源，也有巨大的限制。

事實上不只中國，強勢的西方傳統一樣有巨大的限制，其錯誤的偏向會導致更大的惡果，所以更需要加以省察與批判。難道建基於非西方的前現代的睿識對當代西方提出批評就是向自己臉上貼金嗎？當代西方不該自己好好反省一下，這樣的批判是否合理呢？而且近年來我致力於推廣全球倫

理與宗教對話，預設了一個「多元」架構，而這是現代文明的產物，決非「古已有之」。朗君似乎也有必要超越自己的「成見」(prejudice)，不要對一些不同角度的議論作出過度的解讀罷！而我那篇文章根本不屬於思想史領域，討論的也不是科學層面的問題，似乎也該不辯而明罷！

最後，“Self-assertion”(或德文：Selbstbehauptung)不可譯為「自斷」，而只能譯為「自我肯定」。在中文裏只有武俠小說裏有「自斷經脈」的說法，還沒見過「自斷」作「自我肯定」解的。某種程度的「自我肯定」是有必要的，難道一定要人云亦云，俯仰由人才算開放嗎？立足本位，放眼世界才是最合理的態度。

2003年5月18日於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劉述先 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講座

誰在誤讀誰

● 任東來

朱毓朝的〈回首五十年的《中美外交密辛》——美國對華外交官的口述回憶錄〉(《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3年3月號)，讓我重新翻閱編者唐耐爾(Nancy B. Tucker)兩年前在南京送我的這本書。書中，1949年《中美關係白皮書》主要起草者麥爾比(John

Melby)的回憶和感歎，多少有些歷史嘲諷的味道。《白皮書》的發表本來是典型的落井下石之舉，它發表在蔣介石集團垮台之際，通篇揭露蔣介石的腐敗無能，客觀上突出中國革命勝利的不可避免性，力圖推卸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失敗的責任。此舉開啟了二戰

後美國政府見風使舵，背信棄義，放棄其第三世界獨裁者老朋友的先河。因此，《白皮書》受到美國的「中國幫」（即美國的援外援華集團和支持蔣介石的國會議員，也就是後來的台灣幫）猛烈抨擊，也就不足為奇了。

面對「中國幫」的抨擊，麥爾比心裏想，這一得罪蔣介石及其美國追隨者的舉動，多少應該得到中共的認可吧，「或許他們會喜歡」。但毛澤東撰寫的幾篇《新華日報》社論，以《白皮書》為靶子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批判和冷嘲熱諷，卻讓麥爾比感到一種被誤讀的苦惱。要知道，為《白皮書》的撰寫，麥爾比花費了無數心血：「從3月到8月，我們每天工作18個小時」^①。看來，麥爾比還夠不上一個中國通，如果他仔細研讀毛澤東的評論，就會發現，不是毛澤東誤讀了《白皮書》（實際上，他根本就沒有讀，下面會專門談到），而是麥爾比誤讀了毛澤東。毛澤東炮轟《白皮書》，完全是醉翁之意。

說起來的確有些奇怪，正在忙於指揮百萬大軍「追窮寇」的毛澤東，居然會對相當專業化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產物（防止在野的共和黨在中國問題上抓民主黨政府的小辮子）的《白皮書》表現出如此大的興趣！在他的直接過問下，新華社在1949年8月12日到9月19日連續發表了六篇評論，猛烈地批評《白皮書》。其中除了〈無可奈何的自供狀〉（8月12日）外，其餘五篇〈丟掉幻想，準備鬥爭〉（8月14日）、〈別了，司徒雷登〉（8月18日）、〈為甚麼要討論白皮書〉（8月28日）、〈「友誼」，還是侵略？〉（8月30日）和〈唯心歷史觀的破產〉（9月19日）都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

實際上這裏有兩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一是，毛澤東是否看過《白皮書》的全文和主要部分？從來沒有人問這個問題，包括專門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我也只是在寫作這一評論時才臨時想到這一問題。從時間上來看，毛澤東顯然不可能看到《白皮書》。《白皮書》8月5日才在華盛頓出版，而毛澤東的評論主要寫於8月中下旬，就當時的交通條件而言，毛澤東根本不可能得到原書。即便得到了原書，他手下的翻譯人員也來不及翻譯，因為《白皮書》厚厚一本，總計1,054頁，譯成中文至少在一百萬字以上。它的第一部分是編者的歷史概述，第二部分則是與概述相匹配的原始文件。因此，可以百分之百地確定（從毛澤東評論的引文中也可以判定），毛澤東看到的只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就《白皮書》發表，給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的公開信，該信由美國的通訊社第一時間發表，同時附在《白皮書》上，作為一個序言和導論。所以，嚴格說來，毛澤東評的不是《白皮書》，而是艾奇遜就《白皮書》發表寫給杜魯門的信！

二是，是甚麼觸動了毛澤東的神經，以至於他在沒有看到原書的情況下，在極端繁忙的戰爭狀態下，不惜抽出寶貴時間來猛烈抨擊美國的對華政策？自然，這與毛澤東十分痛恨美國支持其敵人蔣介石集團有關。但他比誰都清楚，他大罵美國人的話，是不會有多少美國人聽到或在意的，實際上，他的目的非常清楚，是典型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的是美國，針對的卻是那些對美國存有幻想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艾奇遜信中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艾奇遜在信中稱：

毛澤東評的不是《白皮書》，而是艾奇遜就《白皮書》發表寫給杜魯門的信！這與毛澤東痛恨美國支持其敵人蔣介石集團有關。但他比誰都清楚，他大罵美國人的話，是不會有多少美國人聽到或在意的，實際上他的目的非常清楚，批的是美國，針對的卻是那些對美國存有幻想的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艾奇遜信中的「民主個人主義者」。

毛澤東猛烈抨擊美國對華政策的《白皮書》，把中國的自由派推上了沒有任何選擇的絕境：或者跟我走，或者成為美國的「走狗」。在近代中國，沒有人敢擔當足以致人於死地且遺臭萬年的「賣國」惡名。毛澤東便在「愛國」的旗幟下，制服了中國殘餘的自由派。

「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着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②。這一段話，讓毛澤東看到了羞辱中國自由派的極好機會。「那些近視的思想糊塗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着，艾奇遜在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裏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③

在毛澤東這一咄咄逼人的解讀面前，那些同樣沒有來得及看《白皮書》的、還留在中國大陸的自由派，當然只有繳槍投降這一條路了，儘管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從1946年《中美商約》後，就再也沒有設想過美國的「仁義道德」，只是覺得美國還不至於壞到要中國亡國亡種。現在，根據毛澤東的解讀和暗示，他們已經自覺不自覺地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且已淪為美國爭取的、用來反對新中國的對象。為此，他們倍感羞愧難當，紛紛表示要與美國劃清界限，堅決站在中國共產黨一邊。當時民主建國會副主席黃炎培的文章就很有代表性。他站隊表態說：「『民主個人主義』一詞已經夠滑稽了，拿來侮辱我們各黨派，更不成話」。一些尚不受毛澤東「誤導」、仍然對美國抱有好感的自由派，則只好託人向美國政府打招呼，說《白皮書》的發表讓毛澤東抓住了把柄，削弱了他們在中國的影響，使他們不敢再多說話，要美國以後不要再公開支持中國的「民主份子」^④。

就這樣，借批判《白皮書》，毛澤東把中國的自由派推上了沒有任何選擇的絕境：或者跟我走，或者成為美國的「走狗」。在近代中國，沒有人敢擔當足以致人於死地且遺臭萬年的「賣國」惡名。於是，毛澤東不費一槍一彈，便在「愛國」的旗幟下，制服了中國殘餘的自由派。《毛澤東選集》的編者就指出：毛澤東對《白皮書》的「這些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並且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理由作了理論上的說明」^⑤。中國近現代歷史道路的紛爭終於有了「圓滿」的答案，用當時中國革命文藝家胡風的詩說：「時間開始了！」用後來美國保守主義學者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話說：「歷史終結了！」

註釋

① Nancy B. Tucker,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62.

②⑤ 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鬥爭〉，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86；1483。

③ 毛澤東：〈別了，司徒雷登〉，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頁1495。

④ 轉引自資中筠：《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頁233-34。

任東來 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